

【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江畅教授

[主持人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本期刊发的第一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继承与发展,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王泽应教授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伦理蕴含和道德气度》大气磅礴,立意深远,从必要性、伦理蕴含、道德气度三个方面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进行了论证。他提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如同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或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并辉以及人类诸文明真正进入到一个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曾勇博士的《“圣谕六言”之阐扬与社会治理——以明儒罗汝芳为中心》视角独特,以小见大,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了罗汝芳对朱元璋“圣谕六言”的阐扬。他认为,罗汝芳将“圣谕六言”与百姓日用之道相贯通,与儒家道统相对接,贯彻于政治实践之中,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成效,这对于当下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组文章是关于当代西方著名价值哲学家思想的两篇专论。文兵教授在《拉兹关于价值普遍性的分析及其局限》中认为,拉兹强调价值的普遍性,力图将价值的普遍性与价值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并绕开道德论证,提出了一条“尊重人”的普遍价值要求;然而拉兹“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虽然肯定了价值存于主体对于对象的评价之中,但这个主体仍然是康德“人是目的”意义上的抽象而空洞的主体。博士研究生张洁婷和翟玉章教授在《行动理由:基于欲望还是基于价值?——帕菲特对客观主义行动理由的辩护》中对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进行了辨析,阐释了帕菲特对于基于欲望的理由的驳斥以及对基于价值的理由的辩护。作者指出,帕菲特通过“痛苦论证”、“全部和全不论证”、“不融贯论证”证明存在着外在、客观、基于价值的理由,以最终证明某种事实给予我们行动的理由而非我们的行动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

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伦理蕴含和道德气度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在地包含有并强烈地呼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伟大国家精神、民族意志和伦理品质的全面复兴,而其所彰显的伦理蕴含、道德气度必将呈现出历久而弥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及健全自我而又协和万邦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如同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或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并辉以及人类诸文明真正进入到一个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在“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境况和气韵中不断实现自己的创造性发展和形态更新的。

[关键词] 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伦理蕴含;道德气度

[中图分类号] B822 ;G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8)01-0001-08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8.01.001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和迎接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目标。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内在地包含有文化和伦理精神的伟大复兴。尤其像

[收稿日期] 2017-09-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资助项目 :16JZD007

[作者简介] 王泽应(1956-)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基础理论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中国这么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并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的“文明型国家”,其伟大复兴内在地呼唤并要求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仅确证、支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引领、行为指南和动力源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伟大国家精神、民族意志和伦理品质的全面复兴,而其所彰显的伦理蕴含、道德气度必将呈现出历久而弥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及健全自我而又协和万邦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如同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或“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并辉以及人类诸文明真正进入到一个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与“华夏文化优越论”或“华夏文化中心论”没有必然的联系,本质上要求世界上诸文明能够实现“并行不悖”、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格局,欣赏和崇尚的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景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所内涵的道德气度。

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并内在要求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民族复兴总是以文化繁荣为前提条件并以文化复兴为价值支撑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兴盛。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的魂魄,也是民族的集体人格特征,是激励和引领民族自强和不断创造的价值源泉。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文明认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在地包含有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确证、价值拱立和精神旗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中体现、本真体现和最高体现,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出了将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文明之果,从而从整体上证成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并由此开启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伟大征程。

(一) 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系于民族精神和文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精神、意志、品格和能力的全面提振、整体扩容和高品位发展,因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当然,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属于唯一的文明国家。”^[1]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比较了世界上 21 种文明,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至今幸存且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文明。称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2] 294}。“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2] 287}。中华文明具有整合各种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人心、统一意志和行动的价值功能,能够在文化统合、价值凝聚中建构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凭藉文化认同、文明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不断强化和深化着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使文化认同、文明认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的精神核心,成为民族创造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成为中国人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源头活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创造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又反过来陶铸涵养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使中华民族成为民族精神 缙生而又不断振奋民族精神的族群,使中国人成为文明古国熏陶培育而又不断促进文明发展的人群。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促进并强化着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中国人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和照搬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她会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创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3] 2}。“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将是空前的,她在源源不断内源性力量支撑的基础上有更加博大的胸襟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因此在造福于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同时更有可能深刻地影响他国和世界,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精神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

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身份及独特个性的表征,积淀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和伦理品质,是人们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建构的是人们赖以栖息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能够抒写“衰而复兴”、“阙而复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辉煌史诗,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贡献了独特的思想智慧、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伦理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艰苦奋斗,创造着自己悠久且不断开新的辉煌历史。

(二)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灵魂,中华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积淀着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认知及创造智慧,也给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以无穷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中华文明崇尚“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在很早的时期起就发展出一种为社稷、为苍生、为天下的群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精神,“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始终是其高扬的主旋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不仅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而且也成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的始基和价值源泉。这种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断砥砺着中华民族的求索奋斗并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华文明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著称于世,特别强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伦理意义,并由此发展出一种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历史主义精神,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价值共识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既充满着连续性和发展的一脉相承,又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辟着中华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道莫盛于趋时”、“德莫贵于日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包括改造自身的过程中革故鼎新。这种精神,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开拓创新的动力源泉。

(三)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精神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5]中华文明凝结着无数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性成果,充满着“旧邦新命”和革故鼎新的价值特质,也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认同,是中国人精神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支撑着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作上下求索的开掘和进取拼搏。1924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人种问题”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6]用“中华民族”、“重振复兴”、“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三个词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的思想,更指出中华民族应对人类文明有新的更大的贡献,彰显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从中华文明中看到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力量和希望所在。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实现“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的目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毛泽东动情地指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这一高度的民族自信其实是建立在对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基础之上的。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在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的日子里,江泽民在天安

门庄严宣告:“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8] 419} 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基本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尽情地汲取理论营养,形成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4]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9] 29}文化自信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自信。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是很难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目标的。

(四)中华文明是推动中国崛起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心理支撑

人类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有着最为内在的价值联系和意义生成关系,亦即不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作为先决条件和支撑条件的民族复兴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了也难以持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核心价值观的强力推动。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一场人与物的现代发展与建设运动,物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作为基础和动力源泉的,没有人的现代化及其思想观念的支撑,即便有了物的现代化,也是很难将其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人的现代化内涵着文化精神的挺立,新型道德品质的锻造以及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人的现代化也意味着人能对传统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伴有一个文化的伟大复兴并以文化的伟大复兴作为价值引领和精神导向,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包含有并且强烈地呼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唯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奋斗目标、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中国要成为世界量级的大国和强国,必须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有一个文化上的崛起和文明复兴,才能真正使自己的崛起有精神的支撑、价值的引导和文化的滋润,也才能使这种复兴既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和人类。从准确、完整的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基础性、根基性、引领性和保障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胜景,才能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价值引领和精神营养,也才能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一种崇高、非凡、卓越、隽永的志业及其“善述其事”、“善继其志”的伦理精神特质,形成“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万善效应,使其朝着“创业垂统”、“建纲立极”的方向运演,彰显出无比的伦理神韵和精神魅力。

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伦理蕴含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也不是重回汉唐时代,而是现代化的伟大创新和重新崛起,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变化后的民族整体精神和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熔铸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之精华的合理吸收和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先进文化或建设文化的全面总结与光大等因素。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既有对传统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全面继承和弘扬,更有对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陶铸、培育与践行,还有在“五位一体”基础上对五大文明的建设与建构,由此彰显出极其丰富的伦理蕴含。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9] 164} 中华伦理文化把

立德视为“三不朽”之首,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价值设定和目的性追求。重“德”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中华传统美德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和内在尊严,主张把人当人看,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儒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讲究“以德配天”,崇尚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美德,强调道德人格的养成,关注人的自觉、自立,人格的成长与发展,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形成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尤以习近平所概括的中华六大基本美德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最^{[9] 164}。“讲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也是最重要的伦理美德。“仁”的根本意义是承认别人与自己同是同类,因此要把他人视为与自己一样的道德主体同等对待,积极意义上的仁是能对别人有所助益和关怀,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消极意义上的仁是要以将心比心的态度对待别人,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仁爱美德包含了修身成己的个体之仁、推己及人的类性之仁、推人及物的成物之仁和生生不息的本体之仁四个内在贯通并不断扩展的层面。讲仁爱不仅是人们进行自我德性修养的始基,也是建构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美德和政治伦理品质。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始终是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伦理美德。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坚持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伦理原则才能使国家政权得以稳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最终决定国家安泰、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人民。“守诚信”自远古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肯定。孔子从多个方面阐述“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并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科目之一(文行忠信)。“信”被列入为人最基本的“五德”：“恭、宽、信、敏、惠”。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对诚信这一伦理美德的内在精神作出了深度的开掘并对其价值予以高度肯定。子思在《中庸》中,首对“诚”作了哲理、伦理的深入阐释,将其提升到“天人之道”来认识,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传承发展子思“诚”的天人之道,将天人合一统一于至诚之境,提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中华文化不仅视诚信为立人之本,而且也视诚信为立业之本和立国之本。“崇正义”是中华伦理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正义是公道正直、公平公正、正当合理的集中体现,它既是社会生活的伦理原则,也是个人应该讲求和培育的伦理美德。孔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崇尚公平正义,主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尚和合”亦即崇尚和推崇和合精神,以和为贵。《管子·幼官》指出:“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借习以悉,莫能伤也。”意即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会产生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管子·兵法》又说:“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这里明确提出和合就能形成和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恰恰是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向往和追求的。“求大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和向往的伦理美德,也是其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尚书·洪范》最早提到了“大同”一词,用来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鬼神同心同德的状态。《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具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和世界太平的本质特征。

此外,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恭宽信敏惠、知仁勇等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美德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也促使其创造了卓尔不群的历史和文化,成就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本身。

(二)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魂和民魂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精神价值的凝结,建构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依凭这一精神家园,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都会生发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感受到来自群体的温暖、慰藉和文化的依存意识。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构建起了一个安身立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家园,有了中国精神这一精神家园的庇护,中国人不可能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只会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这一精神

家园所给与自己的精神力量,形成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精神禀赋,不断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建立自己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子孙的德功事业。中华文化的品格与价值追求,支撑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而且未来必将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融历史上的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革命道德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于一体,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奥运精神等等,都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精神不仅凝聚着中国道路的精神要义,也构成中国力量的精神源泉,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魂。只有用中国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才能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共同生活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表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人文理想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血脉和价值基因,它在历史传承中孕育,在不断扬弃中升华,在紧要关头集中彰显,形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群体人格和精神价值信念,“天下为公”、“苟利国家生死以”、“一身报国有万死”、“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时代精神是社会成员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精神旨趣的综合体现,是此一时代社会发展趋势、人们价值追求和精神生活样态的集中体现。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的大变革、大转型和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创新成为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价值主潮和精神命脉。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改革,既要改革又要创新的精神既成就并促进着我们时代的发展,也引领并支撑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改革创新始终是激励和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不断攻坚克难和取得新胜利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形成的精神气质、伦理禀赋和集体人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国家发展的凝结剂和推进器,也是中华民族超越自我、自觉自信,走向辉煌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要求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是当代中国最具核心意义、关键价值、枢纽功能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国家之德、民族之德和公民个人之德于一体,从根本价值上和终极价值上反映出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价值旨趣和价值特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将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铸造迎接伟大复兴的国魂和民魂,不断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形成全民族的伦理价值共识和共同认可的伦理价值观、道德观,建构的是一个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五位一体”的伦理文明格局及其建构

伟大复兴的伦理文明渗透并贯穿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中,并具体体现在物质文明所内涵的经济伦理,政治文明所内涵的政治伦理,精神文明所内涵的文化伦理,社会文明所内涵的和谐伦理,生态文明所内涵的生态伦理以及党的建设文明所内涵的执政党伦理等领域或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来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要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来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助推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在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可以说,五大文明建设及其所涵容和彰显的伦理思想支撑起新型伦理文明的基本架构,是中华新型伦理文明的价值基础,确证着中华文明的伦理深蕴。

三、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道德气度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如同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或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并

辉以及人类诸文明真正进入到一个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在“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境况和气韵中不断实现自己的创造性发展和形态更新的。

(一) 和谐发展与和平崛起的精神风骨

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是中华文明展现出来的道德气度和道德胸襟,它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崛起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与兴盛不仅不是一种危害,反倒是一种新的发展契机和福音。

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既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坚定不移要走的复兴路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始终是崇尚和谐、追求和平、希望和睦相处和宽容并包的伦理文化。“和为贵”、“协和万邦”、“和气生财”是中华文明自远古以来就孜孜以求并拳拳服膺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外力所迫,而是基于历史的自觉和文化的传统。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民族深邃厚重的文化所系,是人民诚心诚意的愿望所归,是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在。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历史的领先地位,但却没有留下侵犯他国的殖民记录。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10] 58-59}中华文明有着对和平发展道路、和睦融洽伦理以及和合精神的特别推崇、肯定和维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全面继承了源远流长的爱好和平、珍重和谐的伦理文化传统,坚定不移地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是贯穿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风骨”和伦理文化传统,也是当代中国崛起和伟大复兴之不同于他国复兴和崛起的内在道德气度和新王道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 扎根传统与面向未来的价值视野

中华文化复兴实质上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基础上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再造,是一个伟大文明精神和价值的现代复兴。这样一种复兴,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宽阔视野,根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创化,同时也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精神血脉。

推动中华文化复兴,首先应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倍加珍惜、发扬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弘扬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传承、积淀且被历史证明为具有永恒价值和独特魅力的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历代先贤、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乃至庶民百姓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智慧,确证着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方面的致思路径、思维方式、实用理性和实践经验,彰显为卓尔不群的“中国之道”及其具体表现的“中国之德”、“中国之性”和“中国之理”。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不忘本来”以及对中华民族、中国人精神灵魂和安身立命之共有精神家园的肯定、拱立与守护,也构成我们“不忘初心”的本始要件和由此再出发的原点。如果我们民族把自己这一本始要件和再出发的原点给玷污了甚至描黑了,那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自己是在再创辉煌和实现伟大复兴呢?在全球化的时代,无数西方有识之士,都在致力于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盛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拯救和对未来世界的引领意义,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好好地学习、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呢?当然,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为了创造一种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新型文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一种复兴中的创造和创造中的复兴,是一种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化的伟大创造,故此是一种在“为往圣继绝学”基础上的“为万世开太平”。

(三) 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博大襟怀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伦理文明,要求将文明根脉深深扎在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土壤里,发展出自我特色鲜明的文明主体性,并在继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传统美德和伦理文化中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此即如同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如冯友兰所言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立足本国”构成新型伦理文明的源头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离开了本国本土,伦理文明必然失却根脉的支撑与沃土的滋养,那样的无本之根、无源之水既难以发展更难以持久。

推动中华伦理文明复兴,需要吸收世界各国伦理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对之作出创造性整合与转化,以不断拓新其精神气象。人类伦理文明是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各国伦理文化都对人类伦理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也以多样形式为世界伦理文化注入了丰富内涵,并在整体上形成了多元多彩的景观。经验表明,仅以一己之力,或能满足本国伦理文明发展需要,却无法引领世界伦理文明。所以,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伦理文明成果,建构博采众长而又能够涵容诸多伦理文明成果的新型伦理文明,是中华民族伦理文明发展和复兴的内在要求。当下应着力做的工作,是塑造我国国民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大国气度、大国格局,改变和消除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破除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弘扬“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伦理品质和精神,在交流互鉴、兼容并包中彰显中华伦理文明的独特神韵和魅力。只有这样,中华文明的复兴才显示出盛唐海纳百川的气度,而非晚清盲目排外的狭隘。理想的中华伦理文明必须有而且应当有既扎根本土亦即能引领和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精气神,促进本国国民的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主体性品格和位格,又具有面向世界亦即能被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广泛认同,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持久的和平繁荣的精神特质和文明境界。这是一种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立足传统而又面向未来的伦理文明,是一种既能保存并复兴中华传统文明,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兼收并蓄世界文明精华,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伦理文明。这样的伦理文明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一种福音、福惠和福泽!

中华文明有着能够处理好与世界文明、与各国文明关系问题的优秀品质和伦理精神。在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价值信念和文化胸襟始终受到人们的称颂,“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礼尚往来”、“天下大同”的伦理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和主流的地位。中华文明有着善于向异域民族、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类型学习的传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古以来被视为有气度的表征。故此,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在学习、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更新。中华文明始终坚持认为,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各国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也以多样形式为世界文明注入了丰富内涵,并在整体上形成了多元多彩的景观。“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发展的典范,其根本原因在于有立足本土而吸收外来的兼收并蓄的气度和综合创新的智慧,并能依靠这种气度和智慧不断促进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着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生动描画:“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1]³⁷生活于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当代国人无疑是最幸运,同时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人们,唯有坚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再加以实干兴邦、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数百年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 [1] 马丁·雅克.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N].洛杉矶时报,2009-11-22.
- [2]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 [3]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6.
-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 李大钊.人种问题: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演讲(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M]//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7]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M]//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0] 利玛窦·金妮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M]//王德峰.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媛媛]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Analysi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NG Ze-y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include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real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revival of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national will and ethical quality with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ivilized traditions. Its manifestation of ethical implication and moral tolerance is everlas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r the civilization as Fukuyama once described. Instea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stand side by side, and human civilizations have been in a different yet harmonious era.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inherently inclusive and productive.

Review on J. Raz's Universality of Value Theory and Its Limitations

WEN Bing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jection of metaphysics by positivism and the denial of essentialism by analytic philosophy, combined with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of values, seem to render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ity of value unsustainable. Raz,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analytical positivism,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 but also tries to unify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 and the diversity of value. He circumvents the moral argument and puts forward a universal value which requires "respecting people". In this way, he tries to show that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value that he emphasizes can be unified.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Joseph Raz's theory, that is, his analysis of "formalism": it is affirmed that value lies in the subject's evaluation of the object, but this subject is still as abstract and empty as it is involved in Kan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as ends".

Analysis on the Thought-unit-based Reasoning Features during Pre-Qin Logic Development History

LI Xian-zhong

The studies of pre-Qin period logic history used to take "referential theory" as objects and take western logic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They take similar concepts (name), judgment (words), reasoning (statement), and argument (proposition) as basic structures in western logic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But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make it difficult for ancient Chinese logic to be fully developed in a purely formalized way. "Referential theory" and "motivation theory" are closely related, but both affect inferences. They make inferences in the same thought unit and also guide the inference making. What's more, the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integrate "small units of thought" into "large units of thought".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s and Approaches of Chinese Marxist Aesthetics —— Diverging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esthetics System

WANG Zheng-lo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in China develops with a process in which it diverges gradually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esthetic system and proceeds autonomously. The process contains three basic approaches including the shift of thought patterns, the category and proposition integ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mbining Marxism, 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ontext, thus different theoretical forms are shaped. The three approaches mainly correspond 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in China, reflecting the indigenization effort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in some aspects.